

# 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1153710

10位ISBN编号：7301153716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社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洪子诚

页数：23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# 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

### 内容概要

《1956:百花时代》里所要评述的，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。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，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，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。这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，曾被人称为“百花文学”。仿照这一称谓，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，称之为“百花时代”。

这个称谓的由来，主要的根据，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“双百方针”（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）的政策。这个方针的提出，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。它的名称，采用了一种描述性、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，并与中国古代的被“理想化”了的历史情景（战国时代的“诸子百家”的学术繁荣）相联系。这一比喻性概念，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，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，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，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，寄托各自的想象。总之，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“时代”。这个“时代”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。不论是政治、经济，还是文化，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，变得开阔了起来。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，但是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，应该说是有着相当一致的意向。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土壤依然还是那样的土壤，因而即使在这个年代依然有“周扬”式的思想在蔓延。文学依然没有彻底走出“左”的泥沼，当代文学在现在及随后的年代可能会有停滞与倒退的可能。身为这个时代，依然对文学抱有热忱与信仰的年轻人，所做的惟有坚韧地逆行，只有“自由”、“独立”才能使文学富有可能。
- 2、虽然那场有限度的开禁名为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”，虽然本书名叫“百花时代”，实际上看完了之后觉得这是一场“预谋”。规范的惯性太大了，当代文学只能在排除异己的道路上一意孤行，最后，没有赢家。老毛都不是。以后有时间了，再好好了解胡风和周扬。当代文学史，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史的内容，没办法纯粹于“文学”。
- 3、艰涩到读完之后我几乎抓不到中心思想和线索，是我打瞌睡去了吗？
- 4、不及预期。文笔确如洪老师自己承认的那般干涩。论述虽然平实，却嫌清淡，并不大适合那样一个一边是青春火焰，一边是斗争海水的年代。
- 5、感觉从外部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言著中无人可比洪子诚。和其他那几本广度上和方法论上的相比，从细部打开“双百时期”又是别样格局。
- 6、读洪子诚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。他把那样一个鲜花毒草命运不定的时代的冲突、矛盾所在都理得清清楚楚，善于从纷杂的现象后面把握实质性的分歧和其渊源，既明来路，又明去路。后记里说自己枯燥，没有灵性，其实于真挚处感人。做一个明白人不易，做一个“卑以自牧”的谦谦君子，更是不易。
- 7、不注重文本分析和解读而是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生产体制、作家心态、论争脉络等文学生产环境。注重历史背景。被给予的历史舞台决定了人的上限。
- 8、相比《问题与方法》颇多的启发性论点，本书一受制于论述年限，二作者是诸多事件的目击者，所以此书之长短都在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包含感情的分析。
- 9、喜欢这种满篇引号的风格。但是看下去真心痛苦，那个时代的批判文章实在都太恶心了，这些“作家”和“理论家”们自己都不觉得很卑鄙吗？还是鲁迅对周扬的评论看着最爽心：“拉大旗作虎皮，包着自己，去吓唬别人；小不如意，就倚势定人罪名，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”；“对于周起应之类，轻易诬人的青年，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”。清理这些历史，也难怪洪老爷子说：“我真的不喜欢当代文学……”
- 10、做学问啊
- 11、后记跑出了年轻的洪爷爷
- 12、对于「现实主义」、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」问题的探讨十分透彻。
- 13、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年代有哪些作家，都在想什么干什么，里面内容还挺丰富的，那个折腾的年代
- 14、自从今上开了座谈会后，我就决定把此书认真一读，实际上，在座谈会之前，已经翻了翻开头，但洪书确非以文笔活泼生动著称。这两天一鼓作气读完，实在是好，《后记》引用的傅雷和作者个人的出现，更是感人。个人忖度，谢主编选择1956年，是想将这一年看作十七年的高峰，毕竟“双百”了，但在洪先生冷静、冷峭的笔下，56和58清楚分明地连在了一起，在关注外部的大变动的同时，对左翼文学内在理路的梳理，更能见文学史家的功力。
- 15、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一份多么杰出的速写。隐忍下的激情和经过充分的理性过滤仍挥之不去的怅惘，不是更加动人吗？学术作品中很少有这么深沉有力的结尾：“周扬等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，那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事情。”比起著名的“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”，怕也不遑多让吧。
- 16、更多地带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书写
- 17、万物皆有联系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以史为鉴，知进退，知举手投足之法。
- 18、被后记感动了……

1、读沈志华《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》与洪子诚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一旦被认为威胁到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，任何善意对既定方针的既定尝试或改革——大到别国主权，小至文艺创作——均会被无情镇压，这种观念在毛支持苏共出兵匈牙利时已昭然若揭。毛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驱使心态，早在“王实味事件”的处理中便暴露无遗。但凡是准备接受其统治的知识分子，就要做好被他“整”的心理准备，抱有其他幻想者均是愚昧。毛对文艺的控制决心，坚决地包含在“文艺为政治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”的创作要求中。但凡是相信、服膺其要求的学者文人，均没有资格与他讨价还价。针对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口号的种种讨论，或真诚，或教条，或派性斗争，或积极调整，均是无聊的挣扎。胡风、周扬之流是，秦召阳、林默涵之流也是。

一、关于“双百”和“反右”1956年5月26日，陆定一代表中共在怀仁堂向知识分子界作“双百方针”的讲话，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界传递一种信号：中共开始尊重他们的发言权，诚恳地邀请他们参与到建设中来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，稍作犹豫便向“党”的怀抱拥去。这个玩笑的开始，本身就有好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。首先是“诗意表达”中的含混性，用陈思和的话说，“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，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，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，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，犹疑心态。”更有意思的是中共领导层及党内对于知识分子本身的态度犹疑。这在一月份召开的“知识分子”会议的种种讨论中就有端倪，原来知识分子是“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”，而周恩来此时试着大胆地将知识分子划入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。不管毛是否同意这个说法，之前《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》当中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”。对俞平伯和胡适批判的炮火声还没有消退，“胡风”案的影响尚且还在很清晰，知识界为何如此不谨慎呢？这或许和当时国内外的种种政治形势转变有联系。

1956年2月苏中二十大的召开及“秘密报告”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苏共二十大从国外、国内和党内三方面提出了一系非斯大林化的方针，苏联举国上下透露出巨大的“革新”气息。长期被中国文艺界所敬仰、师法的苏联文艺界在此之前就迎来了对日丹诺夫（他是斯大林在文艺界的权威象征）的批判和“解冻”文学的潮流，这岂不让中国知识界、文艺界想入非非？毛泽东一边责备赫鲁晓夫“捅了篓子”，暗地里心花怒放，指出他也“揭了盖子”。他已经从苏联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看到“斯大林模式”的种种弊端，这正是改旗易帜，“走自己的道路”的好时机，岂能错过？面对赫鲁晓夫的愚蠢报告，不管毛的评价和宣传方针如何气定神闲，高瞻远瞩，都不能阻止文艺界对他《讲话》约束的思想越轨了。从国内来看，让知识分子（包括文艺界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，真诚也好，功利也罢，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。“知识分子会议”的召开，让知识分子们受到鼓励和动员，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。陆定一信誓旦旦，表示“在人民内部，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，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”。且不说党外，只要稍稍想起过去几年文艺界的几场批判，这话的可信度能有多少呢？不过，知识界还是相信了，毕竟他像俞平伯当场道歉，表示前些年的斗争有些粗暴。讲话当中，这样一些字句仍然应该引起注意，即“双百”只针对人民内部，仍然应该注意“政治上要分清敌我”。从“双百”受到鼓舞到“反右”被抓了现行，知识分子中间仗义执言的有之，胆大包天的有之，发牢骚、说怪话的有之，三缄其口的也有之，后来的下场大都不好。看看杨显惠《夹边沟记事》中“反右”及其扩大化后果的文章，让人肠一日九回，忽忽若有所失。回想过来，对那些人不免怜悯而哂笑。关于后人所指责“阴谋”、“阳谋”一说，《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》书后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（该段文字在书中并未找到，或删除）：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“危险企图”和“错误倾向”后，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对方法，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秉性——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。所以毛泽东军心继续鼓励鸣放。他就是要看一看，经过近八年的宣传、教育和改造，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，究竟是跟着共产党走，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；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怀疑论者证明，他所提出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的英明正确。然而，随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化令他十分失望，由失望转而愤怒，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，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。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国内外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来看，沈说容易让人接受。若硬要说成“阳谋”，也未尝不可。毛从来就不惮于承认这个荣誉，金冲及在《毛传》中也说了句不冷不痛的话，“这以行为在后来被人成为‘阳谋’”。据闻吴宓、陈寅恪和钱锺书等人倒似乎识破了老毛的把戏，无论如何不开口放炮。

二、关于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和左翼文人的倾轧斗争《诗》曰：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害胡风者谁？于《武训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研究之批判可见。害冯雪峰、丁玲、秦召阳者谁？于“胡风案”之事可见。害周扬、郭沫若者谁？于

冯雪峰、丁玲之事中可见。依此推之，许多文人之死实在不足以使人体恤。所谓“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”，本质上是“左翼”文人的狗咬狗斗争。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当中的现实到底该怎么写？从“批判现实主义”到所谓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的话语转换中，“歌功颂德”的意识形态要求已然暴露无遗，哪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？对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”的解释权，始终被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解释权威自居的周扬牢牢掌控，容不得胡风、冯雪峰等人的染指。“在反对、批判‘胡风集团’、‘丁、陈集团’以及文艺界右派的时候，（东来按，周扬或说“主流派”）都提出了严厉的标准，并将反对派的性质推到定点。而当‘反对派’已经被极大削弱，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体已经不复存在时，‘主流派’便不必要，也不可能总是在这种严格、紧张的立场上维持下去”。用洪子诚的话说，“都是人的自我折磨而已”。盖周扬、林默涵之流文人无行者，代表着毛泽东的激进文学想象，与“五四”精神文学斗，与左翼文学中的异端斗，又反过来与自身斗，都到最后又被另一批新的笔杆子赶下台去。其间周扬如一根搅粪棍棒，深文罗织、网罗锻炼之法无所不用其极。据说直到《红旗》上已经将他定性为“十七年黑线”的头目，周扬还在耐心的安慰家人，相信太祖了解他的忠心。可见如他确实如够一样忠心耿耿，因而被太祖像狗一样对待。倒是鲁迅先生对此人“奴隶总管”的评价到位，可惜他竟然有一点廉耻之心，在这个殊荣面前哆哆嗦嗦，不敢认领。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的后记中不无沮丧，“‘历史’中也许还有同样有价值的部分，甚至更体现人的创造性和精神深度的部分，却被本书忽略。但请相信，这种忽略，不是故意的”接着他将话题引向自身“也许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，但他也层想去发觉的材料，而最终所得不多。”面对傅雷的《独一无二的莫扎特》，他对这位翻译家所树立的生活和艺术目标表示出不解。也就是说，他始终在思考知识分子，或者说是一般人是否可能从那样的浪潮中避免出来？“难道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：这些口号都是人的自我折磨，在白白地破坏我们的智慧和灵性？”超脱者古往今来都有，从许由到陶渊明，“隐士”的文化心理性格一直就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。只是这样的性格到了近代，似乎不那么被接受，真超脱者如梁实秋，假超脱者如张爱玲，都被批倒了。倒是陈思和教授在他的《教程》中试图潜到文学现象的水下去，找到了一些时代洪流中冷静的声音，如陈翔鹤的《陶渊明写<挽歌>》之类的东西。其实这样思想倾向的东西在稍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地下文学就能看清楚些，比如丰子恺先生的《缘缘堂续笔》。现当代文学中，“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”的作家其实难以生存，他们真正感到需要超脱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了。

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的笔记-第10页

对发生于北方国度里的“解冻”文学潮流，不管当时中国文学界的介绍是怎样有限度的、审慎的，但这种强烈的变革的信息，还是可以容易地把握到。中国的同行们显然从中受到启发，也得到鼓舞。当然，对苏联发生的这种变革的估计，中国的文学界在当时可能还没有把握其重要的含义。其实，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都有相似的演化趋势，这就是企图“复活”它们各自的近、现代文学的另一个“传统”，一个被掩埋、被忘却的“线索”。对于苏联文学来说，是由叶赛宁、蒲宁、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、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传统，一个关心人性、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。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，则是复活“五四”新文学，重新唤起“五四”作家的“启蒙”责任和“文人”意识，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。

### 2、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的笔记-第81页

当然，他们的批判现实，并不出自对一个普遍理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怀疑，也不是怀疑他们献身的通过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。他们怀疑的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的虚幻许诺，以及对理想社会已经或即将降临的描述。

### 3、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的笔记-第33页

在一个文学观念发生错动、变革的时期，对“历史”的重新叙述便会自然地提上日程，这也是为这种“变革”寻找根据和“传统”。当然，在这期间，对中国新文学的“传统”的“重估”，主要围绕鲁迅的“五四”文学与延安文学的选择，而还未涉及更广阔的范围。对“左翼文学”和“进步作家”的创作之外的文学“传统”的重新评价的工作，是有限的、十分谨慎的。

### 4、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的笔记-第66页

在一个政治气候变幻莫测、个人对自身的命运难以把握的环境中，善于从种种迹象而窥测到风向的变化，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论和行动，是保护和发展自己的重要前提。那些“迂腐”而真诚的执著者，因此便不配有好的命运。

# 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